

数说经济

“万亿之城”再出发

拓展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贸易形式,是互联网技术与现代贸易的深度融合,在创新商业模式、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打破贸易壁垒方面具备显著的竞争优势,已然成为当前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动能、开辟了新空间。

当前,数字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形态。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38万亿元,增长15.6%;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在2023年前三季度达20259.5亿元,同比增长8.6%,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42%。基于数字科技的服务贸易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发挥,研发服务外包快速增长,数字动漫、网络视听等国际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跨境电商品牌。数字贸易增速大大超过我国同期对外贸易增速,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亮点,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蓝庆新

尽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潜力巨大,但数字贸易顺差规模相比美、欧、日、印度等还有较大差距,数字贸易营商环境、数字贸易话语权、数字产业竞争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差距。地区间数字贸易发展不均衡,跨境电商在信息透明度、售后服务等方面与客户需求不匹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贸易发展空间,亟待综合施策,拓展数字贸易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对我国经贸发展的贡献度。

加强数字贸易顶层设计。针对跨境电商和数字内容产业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数字贸易的支持领域、发展方向及重点,出台支持数字贸易发展的产业政策。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政策,逐步放宽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扩大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在确保经济安全的同时放宽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科学规划建设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数字贸易服务基地、数字贸易产业园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并注意向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倾斜,缩小数字贸易发展的地区差距。

营造良好数字贸易营商环境。加快国内数字领域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数字贸易领域个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审查以及数字化交易方面的立法工作,维护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厘清传统贸易与数字贸易的区别与联系,改革数字贸易监管方式,整合贸易、信息、海关、互联网管理等各领域的资源,创新构建数字贸易监管体系,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提高跨境电商政策透明度,制定B2C模式下的退税及退货规则。积极推动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以及电子认证等相关信息和政策方面的国际交流,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数字证书以及电子签名领域相互认证。

增强国际数字贸易话语权。针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在技术中立等方面的诉求和主张,积极在国际数字贸易领域推动建立相关规则,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合组织机制、“一带一路”合作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形成符合各方利益的标准。合理利用并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构建能够平衡自身利益和国际规则的数字贸易法律法规,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探索负面清单式流动方案,为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供支撑。

推动数字贸易支持性要素资源可持续发展。创新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大力推动教育模式创新,力促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强调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及作用,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持续性的人才资源。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鼓励在数字基础技术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构建数字技术转让及转化平台,支持数字研发和数字贸易品牌企业发展。创新数字贸易产业领域投融资机制,拓展中小型企业企业、电商企业和数字服务贸易企业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数字贸易产业,切实降低数字贸易企业的成本。

从万亿城市、2万亿城市到3万亿城市的全面扩容,映照出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万亿之城”意味着新起点新担当。要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

在爬坡闯关中实现精彩一跃,不容易!对于这些城市而言,靠的是持之以恒的改革、转型升级和激发活力,靠的是以非常之功破解发展之难的定力与能力,意味着城市综合实力达到一个新高度,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版图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武汉市为例,2014年武汉GDP过万亿元,但2020年遭遇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2021年重回经济发展“主赛道”,2023年迈入2万亿元台阶,英雄的城市浴火重生。又如,广州市经济总量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用时8年,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用时5年,跑出了发展加速度。

从万亿城市、2万亿城市到3万亿城市的全面扩容,映照出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当前,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自2006年上海成为全国首座GDP过万亿元的城市以来,城市经济体量升级进入“快速道”。目前,主要城市的竞争目标依然

正从“万亿”向“2万亿”进阶。高光时刻更需冷静。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经济韧性不够强,当家产业、高能级企业不够多,部分行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不足,科技成果供需衔接不畅、转化成效不彰;在孩子抚养教育、年轻人就业成才、老年人就医养老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常州此次成为人口最少的“万亿之城”,其政府工作报告清醒提出,科技创新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作用仍需强化;稳预期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仍需加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仍需提升。

“万亿之城”意味着新起点新担当。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发挥着动力源和增长极的作用。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经济大市同样也要勇担重任。这些城市大多承载着全国主要要素市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综合



完善治理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

黄华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强调,要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竞争力是企业竞争中创造和实现价值的核心,而公司治理为这种能力提供内在支撑,因此,国企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实现。

企业的竞争力在于对于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自身优势、获得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它是动态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公司治理的实质则是通过一整套正式或非正式、内部和外部的机制来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增长。研究表明,不同的治理结构通过影响企业关键性资源所有者的积极性而影响企业关键性资源的积累、改善和有效利用,最终增强企业竞争力。正是不同阶段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着企业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使得其产品和服务

的价值也不断得到提升。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遵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般内涵。它应有助于国企进入不同的市场,包括国内、国际市场;有助于国企形成成熟的企业制度和长期奉行的企业文化及价值导向,并成为其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还应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模仿,这就要求国企要有持续创新的能力。

有鉴于此,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来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需要扎实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坚守管理专业化和财务底线、建立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注重完善立体式的监督约束机制等举措来支撑。若企业可以形成平衡有序的治理架构,并基于此架构实施稳定的公司治理、形成稳定的预期,比如制定稳健的财务政策、遵循专业化分工的经营原则、避免盲目扩张和过度多元化等,同时企业经营管理者尽职尽责、争先创优为企业发展服务,其核心竞争力自然就会提升。

加快

无废城市

李小明

崔子琦

日前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从不同角度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一揽子激励性政策举措,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建共享美丽中国,驱动减污降碳进入“快车道”。《意见》明确,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实现城乡“无废”、环境健康;到2027年,“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明显下降;到2035年,“无废城市”建设实现全覆盖,东部省份率先全域建成“无废城市”,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从城市整体层面将深化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改革作为有力抓手,城市“无废”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涌现出一批可推广示范的治理模式。在深圳等11个城市和雄安新区等5个特殊地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安徽铜陵通过“无废矿山”建设,将废弃矿山变成“绿水青山”;重庆积极创建“无废”学校、“无废”小区等,营造共建共享氛围,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当前“无废城市”建设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不合理的城市更新建设,存在大拆大建、片面追求光鲜亮丽的开发倾向,这将加剧固体废物产生,诸如建设废弃物、工程废弃物等。二是公众节约、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识和行动不足。三是废玻璃、废塑料膜、废木料、废复合包装等低值再生资源,在垃圾总量中占比约为30%,但由于回收利用利润低、成本高,企业缺乏回收利用的积极性。四是固废资源化、无害化技术水平仍然较为落后,无法为源头减量、资源回收、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置等技术环节提供全面支撑。鉴于此,应多措并举,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系统化、科学化、长

效化。

摸清底数,不过度开发。建设“无废城市”,要在全面调研城市固废处理现状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大规模新建、大规模搬迁等城市更新方式,改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提升为主的更新、新发展方式,以内涵集约、绿色发展为路径,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

增强公众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增强集约节约意识,完善固废处置设施和流程,建立公众监督机制。借助多元化的媒体平台,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科学性、必要性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增强公众垃圾分类回收意识,使其发挥作为城市“无废”建设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身体力行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同时,对于固废处理处置设施应保证信息透明化、公开化,固废处置单位应主动为公众监督创造条件,维护公众监督权利,提高公众参与感,避免邻避效应。

提供必要财政补贴,引导企业发挥社会责任。由政府主导,充分引导企业开展固废处理、综合利用等项目研究,以解决城市低值固废处理融资难题,实现城市主要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对环境效益明显但经济效益不明显的低值固废处理应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社会形象,以增加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技术引进与创新并举。因地制宜引进减污降碳技术、危废精细化处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先进技术,科学评估引进后续效果,杜绝“盲目引进、一引了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城市固废处理、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进智能分类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与高校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技术研发,依托现有城市固废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基础,全面提升城市“无废”建设技术支持。



陶小莫作

“祖传神药”靠谱吗

近期有调查发现,不少用户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售卖药品,包括已拆封的药品、国外药品、“祖传秘方”、自制中药等。这类卖家通常没有相关经营资质,各种内服或外用的药品甚至没有相关标准、批号、规格、成分等信息,却宣称“能治百病”,通过二手交易平台悄然流通。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上市、流通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售卖也有资质要求。二手交易平台中的多数药品交易不仅不能保证质量,甚至不能保证药品的品名和内容物一致,有很大安全隐患。在二手交易平台涉药买卖的问题上,各方主体应积极配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药品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时锋)

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积厚成势

李建军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逐步融合,不仅金融消费体验越来越智能化,而且新技术不断嵌入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电子商务等民生领域,促进金融服务更加精细化、多元化。金融机构也在技术加持下提升了自身获客导流的能力、开辟触达客户的新途径,有效提升了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更加精准有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可见,金融科技丰富完善了传统金融的功能,也提升了金融服务质量,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指出,要推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力争到2025年实现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规划》的出台对进一步促进金融与科技更深度融合、更持续发展,以及更好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提供了政策保障。未来,随着金融大模型开发和行业应用的迅速发展,金融科技的运用效率和场景融合能力将得到提升,必将引领金融行业进入新时代。

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布局。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3年中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2023年中国银行业IT投入规模达到了4000亿元,同比增长24.6%,占营业收入的2.8%。中国银行业协会、普华永道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受访银行家认为,金融科技将引领数字化转型,带动业务增长,是银行业未来首要的利润增长点。

完善和提升金融科技服务能力,需要金融机构加强顶层设计,将技术和业务发展相结合,形成全方位的金融科技产品供给体系。确保技术的引入与业务目标的一致性,将金融服务更好地嵌入数字经济的多元化场景,在平台、场景、产品、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形成互补与合力,加速释放科技创新的产出效应,实现金融服务能力的数字化转型,形成基于金融科技的综合服务能力闭环。

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发展须建立在进一步加强生态体系建设的基础上。金融机构、科技创新企业、互联网平台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等金融科技生态圈中的各类经营主体,要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充分发挥在各自细分领域的专业优势,在数字经济、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培养、网络场景搭建、业务重构、政策保障等领域加强合作,促进不同主体和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打造开放、创新、协同的金融科技生态。

同样重要的是,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不能忽视金融安全这一生命线和底线。在新的技术环境下,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会更加隐蔽,波及范围会更加广泛,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会加大,全面提升金融科技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能力十分必要。

应加强对金融科技业务风险的归类 and 梳理,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和长效机制。建立风险“隔离墙”,防范不同风险交叉传染,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机构要做好创新与风险的平衡,对新技术保持敏感度和前瞻性,通过前置监管手段制定规则、引导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规范化发展。加速金融监管沙盒落地,降低合规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数据安全立法,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业务的安全规范。